

陈安湖 著

鲁迅研究 三十年集

* LUXUNYANJIU
SANSHINIANJI

Chen anhu zhu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研究三十年集

陈安湖 著

小 引

李霁野

在鲁迅研究中，近年大家很注意他的思想发展问题，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提出若干不同的看法。意见不尽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不过通过争鸣、讨论，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可能的，也很有必要。因为我们研究鲁迅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他学习。而要学习，最好探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看他在什么时代背景，什么样环境中，有怎样的思想，时代环境变迁了，他又怎样随着时代前进，逐渐达到最高的境界。

我们时常听人说，鲁迅同他的读者心连心，这话是不错的。尽管他自己说，他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全部向读者倾吐，但是我们读他的文章总觉得十分亲切，像同一个老朋友谈天一样。所以鲁迅的文章和书信，是我们探寻他思想发展过程的最好的源泉。但是要统观全貌，不能断章取义，用片断摘句的办法作为论据。

一个人的思想不会凭空发生变化，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有必要了解他某一时期所读的书，所接触的人，所经历的事。鲁迅自己说过，他受进化论的极大影响，因为他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也就是他前期思想的一个方面的基础。他也说：“四·一五”广州的反革命政变把他的进化论思想轰毁了。这次政变是寄生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同新兴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一场生死大搏斗。早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左右分化以后，就已经站在无产阶级左翼，并接触过共产党人，读过马列主义著作的鲁迅，这时不能不在思想上起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我们是不难预料的，但变化的完成却

要经过一段时间。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鲁迅的思想发展中是有迹可寻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鲁迅的思想已开始了新的变化。“三·一八”惨案前后鲁迅同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们的斗争，是继“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后一大发展。这次斗争的锻炼使他摆脱了短期的寂寞彷徨情绪，满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殷切的希望，毅然奔向酝酿着革命暴风雨的南方。

虽然他曾预言，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在反革命政变前，他就警告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因为胜利中可能潜伏着危机，但是他说他还是被血腥的反革命暴行吓得目瞪口呆。这自然只是形容反革命罪行空前残暴，而并不能表示鲁迅有任何懦弱心理。这种残酷的现实是激发他“奋然前行”，继续更勇猛战斗的动力。在上海定居后，在文化“围剿”，白色恐怖严重包围中，鲁迅一面潜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面与反动派短兵相接，写出许多战斗性强、思想性深、艺术性高的文章。这时候鲁迅的思想发展到高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英勇战士，无产阶级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鲁迅思想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五四”前后，“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时期——他都身在前线，在战火中斗争。这种革命实践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他不断无情地解剖自己，用他的形象化说法，就是用普罗米修斯的火煮自己的肉。在研究鲁迅思想发展过程时，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陈南湖同志的《鲁迅研究三十年集》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作品的论文集，一部分曾经在一些期刊上发表过。现在经作者修改辑集印行，以便读者参考。我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收获。

1983年8月9日

序

李何林

陈安湖同志把他多年来研究鲁迅的学术成果之一《鲁迅研究三十年集》寄来，希望我能在书的前边写个序言。

我同安湖同志认识已经三十多年了，1952年秋天，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顺利结束，我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中文系的系主任，安湖同志则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刚好也分配来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安湖同志那时年青奋发，风华正茂，到校不久就担任《现代文选》课的教学任务，他备课认真，阐释深刻，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1953年春天，安湖同志调动工作，离开天津到南方去教书了。从此两地脱离，千里远隔，而音讯常通，他时有书信或文稿寄来，我也经常从报刊上读到他的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

安湖同志多年来在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直坚持研究鲁迅，是鲁迅研究这个学术领域中有成就有影响的中年学者。尤其是万恶的“四人帮”垮台之后，迎来学术研究的大好春光，他写作更勤，论述颇丰，成绩尤著。据我所见，安湖同志对鲁迅的研究，集中在鲁迅思想的研究和作品的评论这两方面。我曾经读到他的一篇有关鲁迅思想发展的论文：《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发展》，精细地论述和分析了鲁迅思想转变的整个发展过程。他结合鲁迅著作中对于一些问题的具体观点的变动和发展，深入细致地揭示了鲁迅在1928年参与革命文学论争前后的思想变化历程。他认为：“从1928年初到1929年，是鲁迅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关键时期；”“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是1929年

前后完成的。”这篇论文，观点深刻，论据有力，分析透彻，读来令人信服。这是多年来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我很高兴地迅速把它推荐给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鲁迅研究的同志们，大多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要他们认真的读一读这篇文章。

对于鲁迅作品的评论，安溯同志的文章侧重在鲁迅小说创作方面。鲁迅的小说，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评论极多，众说纷纭。尤其是象《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名篇佳作，更是见解歧异，观点各别。安溯同志却能对这些作品独抒己见，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论文。

我认为，作为学者或评论家，他的学术评论理应不同于普通读者的评论，他应当看得深一些，想得细一些，善于体察作品的内在涵义，善于感受作品的艺术特性；他应当能够说出一般读者所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说而未能说清的，作品所包藏的社会历史内容或艺术魅力；或者说，他必须善于把一般人对作品的感受和看法，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出中肯的科学的评价。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容易的。这不但需要有广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深厚的艺术修养，而且还应当掌握和运用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鲁迅曾经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及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完”草七》）鲁迅在这里所说的“知人论世”和全面考察的主张，应当是我们研究和评论作家作品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安溯同志对鲁迅作品的评论，就很好地实践和体现了这样的原则。他的有关鲁迅小说或《野草》的评论，总是繁密的联系鲁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联系鲁迅的其它著作，再结合作品的具体描写加以论析的。他的评论，善于发掘鲁迅作品的内在的深刻含意，剖析精到透彻，说理明白晓

畅，虽然他所征引来作为论据的，也仍然是常见常用的材料，但却能发别人所未见所未说的，因而，时有新意，多所创见。他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不落陈套，不囿俗见，往往有新的发现，新的论析。例如，他对阿Q的思想和精神胜利法，对于阿Q的革命性问题，对于《端午节》里方玄绰的思想性格的解剖，对于《伤逝》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和性格的论述，对于散文诗《雪》的分析，都是别具眼光，深入体察，另立新论，不同凡响的。而且，在对作品的艺术形象和细节描写进行精细剖析的字里行间，融汇着那些富有新意的创见。当然，安湖同志的一些见解，也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他的观点本身也不是无可商榷或有待于深化的。但是，通过这些论文，不难看出，安湖同志治学谨严，论析精当，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既不见风使舵，也不随波逐流，这正是他的为人和治学的可贵之处。

安湖同志正当中年，又有着三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丰富经验，而且，身处我们伟大祖国“四化”建设的大好时期，相信他今后会在学术研究上大显身手，在鲁迅研究中作出新的建树，新的贡献。鲁迅在三十年代为青年作家写序时说过这样的话：“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我把它征引来，寄托对于安湖同志的热切希望。

我写了以上的文字，权且当作序言。我还要在这里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作者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会使读者得到教益，受到启发，加深和提高对鲁迅作品的认识，那是确定无疑的。

1983年8月30日
于北京东城

目 录

小引·····	李霁野
序·····	李何林
鲁迅的道路·····	1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发展·····	56
关于鲁迅的进化论和人道主义问题·····	105
“愚人”和“聪明人”问题研究·····	120
鲁迅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140
论《狂人日记》的思想·····	156
《狂人日记》散论·····	173
说《孔乙己》·····	186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	202
《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	230
论阿Q和阿Q精神·····	247
论阿Q的反抗性、革命性及其他·····	281
论《风波》·····	302
论《伤逝》·····	315
论方玄绰·····	341
论《呐喊》的现实主义·····	352
论《故事新编》·····	377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想·····	389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评论·····	406
鲁迅后期杂文概述·····	422
说《雪》·····	434
关于《雪》的论辩·····	445
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商讨·····	458
关于鲁迅前期进化论问题·····	492
写在王富仁同志的答辩之后·····	508
后 记 ·····	527

鲁迅的道路

出生和家庭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里的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周家在当地是一个有名望的大家族。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进士，鲁迅出生时，正在北京做官（翰林编修）。父亲周凤仪，字伯宜，是个秀才，在家闲居。母亲鲁瑞，出身于农村的地主家庭，她以自学得到看书的能力。鲁迅很小的时候，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

少年叛逆者

鲁迅七岁进私塾读书，读的是中国古代儒家的经典，鲁迅从小具有叛逆的性格，他对这些宣扬孔孟之道的难懂的古籍并不感兴趣，对于束缚小孩思想的封建教育制度十分反感，在“正课”之外，常去搜集和阅读那些为儒者所看不起的历代的“野史”、笔记和小说，因为它们往往比“正史”更真实地反映封建社会的历史面目，使鲁迅更深切地认识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的黑暗，对鲁迅的思想影响很大。同时，鲁迅对民族的和民间的故事、传说和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背着儒师，用一种薄而透明的“荆川纸”描画各种小说的绣像。那时民间流行的通俗的有画的书籍，如《山海经》、《毛诗品物图考》等都是鲁迅幼年“最为心爱的宝书”^①。对民族和民间艺术的爱好，成为鲁迅后

① 《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

来对民族和民间艺术传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以及创作上民族风格的提倡的开端。

幼年的鲁迅，每年都要跟随母亲到农村的外祖母家里去住一个时候，这使他看到了一个与城里的官僚地主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接触了与地主阶级完全不同的人物——农村的劳苦农民。这是鲁迅最早同农民的联系。这实际的接触，使他看到了广大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也看到了他们刻苦耐劳、纯朴浑厚的阶级性格。农民的孩子和农村的事物使鲁迅感到新鲜、亲切，成了他后来的创作灵感和小说题材的来源。鲁迅和农民的联系，他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以及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正是他前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

“走异路，逃异地”——接触维新思潮

鲁迅出生和少年时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联合共同压迫中国人民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迅速崩溃，造成了广大人民的深重苦难，也激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鲁迅十三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祖父因科场作弊案被清政府逮捕下狱，接着父亲又病了三年，终于死去。鲁迅的家庭因此彻底败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①。鲁迅从自己家庭的败落，进一步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虚伪和腐败。他在家乡已不能再进学校，上流社会许多人（包括自己的家族）对鲁迅一家的冷眼和侮蔑，也使他不能忍受下去，他坚决要

①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

“走异路，逃异地”^①。于是他带着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路费，于1898年4月前往南京。5月即考进江南水师学堂，次年2月，又改入矿务铁路学堂。

那正是戊戌变法的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输入，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十九世纪末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维新派是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敢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企图在帝国主义帮助下，依靠清朝的光绪皇帝实现维新救国的目的。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现以前，它还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思想界正在进行着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激烈论战。维新派大量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在这新思潮的推动下，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的报纸和书籍陆续出版，有力地打破了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的严密统制，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使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从封建文化专制下解放出来，对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鲁迅到南京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他自己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②。鲁迅非常热切地学习这些新学问，不但经常阅读维新派的《时务报》、《译学汇编》，还读了不少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和文学著作。在一个星期天，他在南京城南买来了一本严复译述的英国著名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国家找寻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1894年甲午之战以后，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情况下，他怀着强

①②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

烈的爱国热情译述了《天演论》。这是宣传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论著，书的前半部着重解释自然现象，是唯物的，后半部着重解释社会现象（伦理过程），是唯心的。作者一开始就以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知识，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斗争的物质世界的图景，揭示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规律，对当时中国统治阶级所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孔教，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在思想界影响极大，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以这书所宣传的进化论思想为武器，同封建顽固派进行斗争，由此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思潮。少年鲁迅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他完全被书中的新颖思想吸引住了，受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有一个在南京的本家老前辈叫他不要读这一类离经叛道的书，鲁迅以轻蔑的态度回答了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烤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

这本书使鲁迅第一次明白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道理。少年的鲁迅还不可能懂得阶级斗争的学说，也还分不清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线，他是从挽救民族危机的要求出发来理解和接受《天演论》的思想的。他由“物竞天择”的道理悟到中国民族的落后和危险的处境，如果不彻底改革，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就不能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争得立足之地，这样就形成他的斗争的观点。其次，他由进化论也悟到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这样也就初步形成了他的发展观点。鲁迅接受进化论，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的胡适不同，后者利用进化论来鼓吹旨在保存旧制度旧事物的“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鲁迅则利用进化论来作为进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武器。

① 《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

鲁迅在南京四年时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1900年义和团反帝斗争给了帝国主义严重的打击，但由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不堪，紧接而来的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和1901年“辛丑和约”的签订，把中国推向了更深的民族危机之中，对鲁迅的刺激很大。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爱国救亡的思想，在鲁迅心里早已逐渐形成和发展了，《天演论》又给了他一个有力的战斗武器，使他看到了救亡图存的新路，这是少年鲁迅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

1902年1月，鲁迅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因为成绩优异，4月被派往日本留学。

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①。

少年的鲁迅，正如其他爱国的先驱者一样，痛感于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危亡，时刻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到日本留学，正是由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渐强，当时被认为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获得成功的范例。鲁迅在南京的时候，就研究过日本的维新运动，“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所以决心到日本专门研究西方的医学。他说：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業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②。鲁迅把日本维新的成功归因于医学，当然是不正确的，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

②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

但这种认识当时的确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他满腔热情，决心以医学为武器，献身于祖国伟大的革命事业。到日本不久，他就写下了下面一首《自题小像》，表明了自己的心愿。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鲁迅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是他毕生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豪迈的誓言。

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

鲁迅到日本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新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适应着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高举革命的旗帜，提出“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组织了一个新的革命阵营。然而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对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思想界挑起了一场关于革命和保皇的大论战。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中国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外的主要活动基地，关于革命和保皇的大论战，主要就在这里进行。从1903年至1907年，通过几年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较彻底地清除了保皇党的思想影响，大大发扬了中国人民的种族民主革命精神，把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为辛亥革命的进行打下了极其稳固的基础。

在这一场论战中，鲁迅坚决地站在革命派一边。他到东京以后，除了在弘文学院学日文，准备进医学专门学校外，就是赴会馆（这是革命派集会的地方），跑书店，听讲演，参加革命派的

各种活动。同时也开始在革命派主持的刊物上写文章，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他在《浙江潮》上发表《斯巴达之魂》，用斯巴达人抗击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不久又写了《中国地质略论》，斥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强烈要求保护祖国的资源和主权，不容帝国主义掠夺，声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①。这是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的表现。

鲁迅与当时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同，他们往往把“推翻清廷”看成是革命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所以只热衷于狭隘的“排满”的宣传，很少想到中国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新。鲁迅也热烈支持“推翻清廷”的民族革命，但同时也想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新问题。还在弘文学院的时候，他就注意研究中国的“国民性”，思索这样一些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当时自然还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他重视人民的思想精神，企图启发人民的觉悟，要求解除封建主义对人民的思想束缚，清除“国民性”中的消极落后因素，这无疑有重大的革命意义，是鲁迅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最本质的特色。

光辉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开端

1904年，鲁迅为实现“医学救国”的宏愿，进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但只读了两年，就由于一次课间的电影（实际上是幻灯片），打破了他的“医学救国”的信念。那是日俄战争（1905年）的时候，学校放映了战争的新闻纪录画面，一个中国人据说

^① 《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

是因为替俄军做了侦探，被日军捉住杀头示众。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事给了鲁迅很大的刺激。这学期没有结束，他就到东京去了。因为他从此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事情看来很偶然，事实上并非偶然，这是鲁迅到日本后长期研究“国民性”，探索革命道路的结果。

鲁迅1906年从仙台回到东京，开始了他一生的光辉的文学革命事业。

1907年，他和许寿裳、周作人等人在东京筹办文学杂志《新生》，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没有出成。鲁迅于是转而继续给中国留学生办的杂志写文章，并从事东欧、北欧以及俄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后来和周作人出了两集《域外小说集》。这个时期，鲁迅认识了当时有名的学者和革命家章太炎，并和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等按期听章太炎讲文字学。还加入了革命团体光复会，积极投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这时期，鲁迅写了不少长篇论文，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潮，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康梁保皇派的反动本质，系统地阐述了自己长期所思索的改革中国的主张。

早期革命的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

鲁迅在南京以至到日本的初期，学习的重点是西方的自然科学。这不但因为他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也因为他当时怀着坚定的“科学救国”的信念，想通过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和宣

^①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